

光 华 文 存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复刊30周年论文精选

史学卷 黄颂杰 主编 吕晓刚 周桂发 副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黄颂杰 主编 吕晓刚 周桂发 副主编

光 华 文 存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复刊30周年论文精选

史学卷

 復旦大學出版社



《光华文存》编委会

主 任：章培恒

副主任：桑玉成 萧思健 方晶刚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方晶刚 孔爱国 石 磊 伍柏麟 吕晓刚 吴心伯

吴晓明 陈广宏 陈思和 陈明明 张汝伦 周振鹤

周桂发 金重远 姜义华 俞吾金 桑玉成 章培恒

黄颂杰 黄 霖 萧思健

主 编：黄颂杰

副主编：吕晓刚 周桂发

执行编辑：张 兵 陈文彬 陈涯倩 吕晓刚 柏 栎

宏揚傳統
融貫中西

秦紹德

賀《復旦學報》復刊三十周年

發揚學術
砥礪思想

王生洪
二〇〇八年四月

总 序 一

章培恒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时的情景——特别是由此在校内引起的欢欣鼓舞——还恍如昨日,却已30年过去了。这固然不得不使人感慨于时光流逝的迅疾,但更意味着近30年来社会发展快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虽然还有弱势群体存在,却也较清晰地看到了希望所在。否则,度日如年,对日子是只会嫌其过得太慢的。

至于那时的欢欣鼓舞,实在不只是由于《复旦学报》的复刊,而是由于复刊的《复旦学报》所追求的学术品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无所畏惧地探索、创新,既富于时代性,又富于学术性。这种追求是在复刊第1期就鲜明地显现出来的。该期所载当时校党委书记夏征农同志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便是其最突出的代表。但要充分了解其意义,则必须联系其时代背景稍作阐述。

“文革”期间,“四人帮”假借无产阶级专政之名,疯狂破坏人民民主,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就指出的,他们搞的实质是封建专制主义(见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而且,为了搞封建专制主义,他们把民主说成是资产阶级用以颠覆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所以,无论是为了揭批“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实质,还是为了防止封建专制主义的再次肆虐,都有必要阐明民主的重要性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这也牵涉当时思想界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原来,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

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通常简称为“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提出上述方针,是经当时的中央领导决定、批准的。这样一来,给人民和国家造成巨大灾难的“文革”不但不能被否定、批判,今后还得根据“最高指示”每隔七八年再搞一次;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关的一切已造成严重后果的政策、措施必须继续执行,一切冤假错案也根本不能平反;与此同时,由于“四人帮”的许多罪行和反动谬论(包括他们的疯狂破坏人民民主和对民主的蓄意攻击)往往是以“拉大旗当虎皮”的手段制造出来的,根据上述方针当然也就不能反对而应加以维护了。

正是看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危害性,尚未获得平反的邓小平同志在同年4月就公开表示“‘两个凡是’不行”(见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自1977年3月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原就不同意“两个凡是”,在得知了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讲话后,“更加坚定了从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信心”(同上书,第221页)。同时,在理论界也有一些勇敢而敏锐的学者自动地在抵制、反对“两个凡是”。于是,在胡耀邦同志的组织和支持下,党内理论战线上的几位有相当地位的负责同志(包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当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同志)和理论界的有生力量共同努力,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文,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新华社当天便作为重要文章予以转发,《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与全国七家省市级大报于次日全文转载。这就揭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大论战的序幕(同上书,第224—227页)。

不过,“两个凡是”是经当时的中央领导批准、决定的,提倡和支持者位高权重,远在胡耀邦同志之上。所以,这场论战一开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张者就受到了沉重的压力,被批判为“砍旗”——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胡耀邦同志也受到了点名批评。虽然邓小平同志在同年7月22日与胡耀邦同志的谈话中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上书,第227—229页),但还不足以推翻中央领导正式批准、决定的“两个凡是”。直到同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

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还有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指责,反对“两个凡是”者则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经过这样面对面的争论,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正式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这场斗争才有了明确的结论(见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230、232—233页)。

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第1期是在1978年10月出版的,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斗争激烈、尚未见出分晓的时期。此期所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显然与毛主席在“文革”时期的某些论述——例如要“在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相矛盾,从而也是与“两个凡是”相对立的;全文洋溢着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无所畏惧地探索、创新的精神。其提出这个基本观点的理论前提则只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其所论证的问题和提出的主张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人民利益极为重要,其论证又切中要害、深刻有力,可以说这是一篇富于时代性和学术性的力作。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篇来,乃是为了说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自复刊以来所追求的是怎样的一种学术品格。从复刊第1期我们也就意识到了复旦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今后将沿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当时校内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复刊而欢欣鼓舞,其故便在于此。

现在,《复旦学报》复刊已经30年了。自复刊以来所追求的这种学术品格已越来越鲜明而突出,无论社会科学抑或人文学科方面的论文全都如此(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文学科的有些论文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都是为了推动当代的人文学科的发展,因而仍然具有时代性)。对此,我们感到无限的欣慰。

为了纪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30周年,我们从中选编了这部论文集。限于篇幅,也限于我们的水平,选编工作不能不存在若干失误,诚恳地希望读者赐予教正。

总 序 二

俞吾金

记得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深入地加以思索，敬畏之情就越增长，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其实，在阅读那些经天纬地、笔力千钧的学术论著时，也会油然而生“高山仰之，景行行止”的感受。

当五大卷厚厚的纪念文集摆放在眼前时，我们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从内容上看，这些文集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几乎涵盖了复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部领域。其中既有以“为往圣继绝学”自况的前辈大师留下的畛域广泛、烛隐发微的珍贵文字，也有以“守护思想”自期的中青年学者写下的返本开新、自出机杼的扛鼎之作。其气象之恢宏，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其说理之缜密，宛如水银之泻地，雕琢之无痕。庄子云：“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这五大卷的纪念文集不正是复旦深厚久远的学思传统的一个真实写照吗？

当我们逐卷浏览文集中的一篇篇杰作时，一阵阵新观念的热浪迎面向我们扑来。从风格上看，这些佳构包罗宏富，色彩纷呈：或考证精审，微言大义；或征事数典，抉发详备；或放言高谈，臧否人物；或独造精微，自成体系。似乎思想的会饮在此岸举行，仿佛精神的百花在这里盛开。从内涵上看，它们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一是正本清源。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还没有完全从“十年浩劫”的阴影中走出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仍然梦魇般地支配着他们的大脑，而“两个凡是”的错误观念又为思想戴上

了新的桎梏。于是,解放思想、正本清源就成了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曾几何时,当《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出第一声狮吼的时候,复旦学人紧随其后,在思想学术领域里擎起了拨乱反正的大旗。夏征农先生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漆琪生先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过时了吗?》、全增嘏先生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王中先生的《论评论文写作和新闻学上的几个问题》等雄文,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别伪求真,发隐举疑,堪称这方面的开山之作,积极地推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是接续传统。人所共知,“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思想观念常常是以文化虚无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这种表现方式中,传统被推进了硫酸池,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当代中国人的思想似乎像智慧女神雅典娜一样,突然从宙斯的脑袋里蹦跳出来。不用说,这是一个十足的现代神话。历史和实践一再启示我们,即使当某些人以“反传统”自诩时,他们实际上仍然是从属于传统的,因为传统内部本来就蕴含着“反传统”的要素。要言之,“反传统”本身也是一种传统,因而当代人对传统的抗衡,犹如婴儿对母腹、麦子对镰刀的反抗,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当然,肯定传统的重要作用并不等于说它是固定不变的。诚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既然我们始终置身于传统之中,那么试图抹掉传统,就像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必定是荒谬之举。正确的做法是,从当代生活世界的本质出发,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这方面,王遽常先生的《顾亭林逝世三百周年祭》、周谷城先生的《儒学别解》、陈子展先生的《〈橘颂〉解》、郭绍虞先生的《提倡一点文体分类学》、蔡尚思先生的《朱熹的书院教育与礼教思想》、严北溟先生的《论佛教的美学思想》等大文,持论平允,见解深邃,取精用宏,含英咀华,在对传统的接续和反思上,真可谓功不在禹下!

三是融贯中西。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是,西学东渐又形成了新的高潮。与闭关自守时期百花凋零的学术窘境相对峙的是改革开放时期思想文化上的繁荣昌盛。即便在风雨如磐、素缟遭染、人人谈西学而色变的日子里,复旦学人仍然不聳时尚,不逐时流,孜孜不倦地埋首于对西学经典和最新思潮的探索中。贾植芳先生的《中国比较文

学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汪熙先生的《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刘星汉先生的《国际人权保障与美国人权外交》、刘放桐先生的《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金重远先生的《戴高乐的五月十三日》等佳作，陶铸百家，钳锤中外，英姿神迈，独标悬解，无人能出其右。

四是戛戛独造。在披阅文集时，感受最深的是复旦学人老吏断狱般的治学态度和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创新精神。他们既不泥古崇古，唯前人之马首是瞻，也不矫情鸣高，奉西学之定论为圭臬，而是泛滥百家，首创山林，融贯中西，自造新境。顾颉刚、谭其骧先生的《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周予同先生的《“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胡曲园先生的《从〈老子〉说到中国古代社会》、朱东润先生的《论传记文学》、蒋学模先生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章培恒先生的《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与写作年代》等巨制，提挈纲维，开示蕴奥，大音希声，震古烁今，犹如空谷石崩，留下了经久不息的回音。

阅毕文集，如坐春风，掩卷而思，感慨良久。最令人欣慰的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复旦青年才俊也远绍前贤，近取同志，寂寞孤怀，卓然颖出，成绩斐然，难分轩輊。限于序言的篇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然而，他们不迷信古人，不趋附时相，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守定身心，厚积薄发的治学精神表明，复旦学思传统的血脉已经贯通下来，足见斯道不孤矣！尽管浮躁情绪不绝如缕，像靡菲斯特菲勒斯一样纠缠着中国人，但复旦学人却愿意不徇流俗，不囿旧说，掉背孤行，心无旁骛地浸淫于学术之中，并把德国诗人歌德在《浮士德》中的箴言引为同调：

浮光只图炫耀一时，
真品才能传诸后世。

分 卷 序

姜义华

复旦大学创办伊始,便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外历史教育,1925年正式设立史地系。数十年来,名师汇聚,学术积淀极为丰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非常的年代,以谭其骧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刚走出牛棚,一边继续接受批判、斗争,一边仍在坚持绘制毛泽东先前提议的多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从事周恩来总理嘱咐和关注的《沙俄侵华史》、《日本军国主义史》、《战后日本经济》等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学界如井喷一样,走在各学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前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也不例外。收录在本集中的50余篇论文,绝大部分作者都曾经在或正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另一部分作者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也都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多次来复旦大学讲学,也很高兴地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交《复旦学报》发表。这些论文,只是这些作者30年来研究成果一角,因为篇幅所限,每人只能选录一篇,但亦足展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从拨乱反正到开创全新局面的发展轨迹,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成长与复兴的一个缩影。

首先,从这些论文可以看出,30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如何激醒了大量被长时间遗忘、掩埋或曲解了的历史记忆。五四爱国运动以往历史记述中,独缺清华,王造时《在五四运动中》填补了这一空白。这篇文章发表时,这位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民主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君子”在“文革”中已被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这是从他在监狱中所写的自述中选录的,作为对他的纪念。因为清华当年这场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竟是罗隆基、王造时这些被

忌讳的人物,这段历史记忆也就被人为地忘却了。如今,人们的历史记忆超越了先前只局限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狭窄范围,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文明认同,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世俗化、世界化进程,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解放,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结构转型,纷纷成为历史记忆新的关注热点。历史认识的视野由此越来越开阔。对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世界由何而来,全局真实状况究竟如何等问题,人们就能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从《复旦学报》上选录的这几十篇论文虽然数量有限,但从中不难看出,社会实践的伟大变革是如何有效地释放了历史记忆,多维视野下的历史记忆又如何有效地帮助人们更为全面、更为深刻地认识自身。

同时,从这些论文还可以看出,当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超越了先前的“西化”与“苏化”两大模式,而努力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自身道路时,历史诠释如何相应地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马克思本人所发现和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仍旧为中国历史学家们所遵从,但他们对很长一段时间因政治权力和领袖权威而被视为“绝对真理”的若干诠释模式提出了质疑,历史事变、历史运动不再被实际上视为由伟大人物或政治事件所决定的,物质生产,物质生活,下层民众的真实思想、感情、行为方式,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历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的结合,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成就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广泛使用,使历史诠释越来越多样化、多层次化。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由顾颉刚、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胡厚宣、杨宽、马长寿、耿淡如、蔡尚思那一代学人奠定的,即复旦校训所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严谨学风,经由金冲及、汪熙、田汝康等,一直传承下来,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与光大。

30年来,中国历史学界的历史书写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档案、文献、实物、图像、声音,越来越广泛地为人们所自觉使用。除去宏大叙事继续为人们所关注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深入细微的个案研究、微观研究。各种观念如何产生和演绎,各种制度如何孕育、诞生和实际运作,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如何形成和演变,村庄、城市、企业、学校、教堂寺院、社区真实场景如何再现,特别是公众史学的兴趣,使历史学走出殿堂,回归大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师

生们在历史书写方式这一深刻转型中,也常常走在全国前列。这一点在本集所选录的论文中应当说表现得也相当突出。学术论文的书写自有其成熟的规范,但是,历史研究并非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归根结底,历史研究的成果要交给社会,要交给大众,因之,历史书写方式的多样化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不仅发表复旦大学师生的学术成果,还发表了国内外其他许多作者的学术论文,它不仅是复旦人,而且也是国内外学人共有的一个重要的公共学术空间。坚守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学术刊物得以生存,并赢得崇高学术信誉的根本规则。以历史学而言,学报先前这样做了,相信今后将会做得更好。

目
 录

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	顾颉刚 谭其骧(1)
明初与蒙古关系	陈守实(18)
“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	周予同(27)
儒学别解	周谷城(36)
在“五四”运动中	王造时(39)
朱熹的书院教育与礼教思想	蔡尚思(50)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	杨 宽(58)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驳法国汉学家戈岱司在这个 问题上的看法	田汝康(75)
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	汪 熙(87)
一八六七年同文馆的争议——洋务运动专题研究 之一	[美] 刘广京(120)
罗斯福与珍珠港事件	邓蜀生(129)
洋务运动与儒学传统	陈 绛(151)
论孙中山走过的道路	金冲及(168)
国共两党抗日持久战略比较研究	余子道(179)
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的投敌	黄美真 张 云(199)
1957 年：良机与逆转	李华兴(213)
《太平寰宇记》成书年代及版本问题	王文楚(231)
戴高乐的五月十三日	金重远(240)
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	张修桂(260)
“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	邹逸麟(275)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朱维铮(289)
康有为的联满倒袁计划	杨天石(313)
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兼论中国	
近代史的开端	沈渭滨(322)
东林非党论	樊树志(342)
汉唐时期中国与师子国的关系	许道勋 赵克尧 范邦瑾(359)
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评余英时	
《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	姜义华(369)
论民国初年的政党、党争与社会	杨立强(390)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	张广智(411)
历史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	周振鹤(432)
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葛剑雄(443)
从唐六脏到明六脏	程天权(452)
庐山面目:论研究视野和模式的重要性	张隆溪(462)
考古学与未来:工业文明的忧虑	陈 淳(475)
追溯匈奴的前史——兼论司马迁对“史道”的突破	姚大力(493)
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	葛兆光(505)
异文化之间相互思想理解的可能性	〔日〕末木文美士(532)
黄浦江水系形成原因述要	满志敏(546)
沃勒斯坦与“世界体系理论”	顾云深(557)
客家南宋源流说	吴松弟(567)
顾维钧与中美关于“二十一条”的外交活动	金光耀(581)
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架构	戴鞍钢(591)
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	李焯然(603)
接受环境对翻译原本选择的影响——林译哈葛德	
小说的一个分析	邹振环(620)
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的人地关系——多学科交叉的	
实践与探索	高蒙河(634)
章太炎与章学诚	张荣华(647)
博物馆与中国近代以来公共意识的拓展	杨志刚(662)
中国大遗址保护的现状、问题及政策思考	陆建松(673)
从客家文化背景看《天朝田亩制度》之由来	王振忠(685)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

一个侧面	章 清(701)
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形成	黄 洋(719)
商人阶层的出现与社会价值观的转型	赵立行(729)
后记	黄颂杰(740)